

1935年12月9日的北平寒风凛冽,滴水成冰,再寒冷的天气也压抑不住人们心中的怒火,“停止内战,一致对外!”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口号激荡在古都上空,一二·九运动正式爆发。济南人江凌作为鼓动者在游行队伍中来回穿梭,多次参与组织和策划随后的一系列游行示威,并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
【齐鲁英雄谱】

□马继业

江凌本姓刘,原名刘松云,因革命需要,先后用过耶夫、柳也夫、江清风等名,但用时最长,最为人们熟知的当数刘江凌。1909年12月,江凌出生在原济南市长清县陡沟村(现市中区陡沟街道办事处)一户富裕的书香人家,后来迁到济南近郊的南大槐树北街。江凌在济南小学毕业后,因为父亲(曾在北洋军中任职)的缘故,进入当时以追求思想进步闻名的天津南开中学读书。当时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鼓励学生组织各种社团。江凌不仅在学生会中非常活跃,负责南开中学编辑部,还加入了自治励学会,成为南开诸生中比较有影响的人物。

1926年,经进步学者杨尔璜介绍,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入团后江凌如鱼得水,经常与积极分子在一起讨论如何做学生工作,如何具体地进行学校革命工作。他反对禁闭思想,反对读死书,死读书,与反动的学生走狗作斗争,因此惹恼了当局。1928年,江凌被南开中学开除。1929年,江凌考入北京大学后,常与进步学生吴砚农在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阅读进步书籍。1932年1月9日,时任北平团市委宣传部长胡乔木与江凌彻夜长谈,发展他入党。第二天由胡乔木、林枫主持了江凌入党仪式。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江凌的入党是无候补期的,即没有经过预备期而转为正式党员,这在当时需要严格审查的特殊历史时期是非常罕见的,他以自己的表现赢得了党组织的高度信任。此后,江凌先后担任北平学联、北平抗联主席,党内是党团书记。

1935年“华北事变”后,民族危机空前严重。“华北之大,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。”就在此时,传来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2月9日成立的消息,北平学联党团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抗日救国请愿。

12月9日上午9点,北大学生因军警干扰尚未集合,正好东北大学同学冲入北大,先跑进去的学运骨干黄敬与江凌两

## 江凌与一二·九运动



▲北平学生的游行队伍



▲江凌学生时期照片

人一起跑去敲响了北大的校钟,指挥北大同学集合后冲出校门。10时许,北平大中学校数千人集中于新华门前举行了抗日救国游行。此后的12月16日,江凌又参与策划进行了一系列示威游行。

两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得到了全国的广泛响应和声援,迫使日伪华北独立的阴谋破产。国民党当局极力拉拢学生去南京“聆训”,企图分化学生。12月下旬的一天深夜,北平学联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。江凌发言说:我们不能对南京政府抱有幻想,我们必须到农村去宣传抗日救国,唤起民众。他的演讲感动了许多人,话音一落,会场上“哗”地一下高高地扬起了数十条手臂,终于通过了组织南下宣团的决议,国民党的“聆训”阴谋随之破产。

1936年1月,“平津学生联合

会扩大宣传团”正式成立,有4个团,共约500人,其中大多数都是一二·九运动中的骨干分子。宣传团内部组织十分严密,下设宣传、组织、调查、交通四个委员会,江凌负责最重要的宣传工作,对南下途中的宣传发挥了领导骨干作用。

继而,江凌又赴济南、徐州、南京等地动员学生参加救亡运动,其中还发生了这样一段插曲。当时钱伟长和清华学生组织了“清华自行车南下宣传队”,骑自行车到南京去,抗议蒋介石卖国投敌。1936年1月4日在济南,钱伟长接受了北平学联代表江凌转达给他的任务——要在1月15日前赶到南京,阻止蒋介石接见“伪代表”的“聆训会”,揭露他镇压、破坏学生抗日运动的阴谋。江凌的上述活动大大推动了一二·九运动的深入发展。

一二·九运动后期,平津学联决定发起组织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,随后派江凌前往上海筹建全国学联,以推动全国学生运动的开展。当时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积极指导建立全国各界抗日救国会,他的秘书林枫专门为江凌开具了介绍信,让江凌到上海去找时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的胡乔木接洽。

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,江凌在上海旧租界中一家比较体面的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,他经常穿着整齐的西服,外加灰色人字呢的西式大衣,携带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,打扮得像

洋行里的职员。密探特务们怎么也料不到在他的公文包里,经常放着他们日夜想查获的重要文件。

1936年5月29日,“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”在上海圆明园路基督教青年会总部(借用那里做会场)召开成立大会,与会者有各地学联代表28人。江凌当时以北平地区代表的身份参会,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学联主席,负责领导全国学联的工作。由于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,全国学联只能半公开活动,他们随时会遭到反动当局的抓捕,所以变换住址是常事,例如亚尔培路、马思南路(均为旧名)等,他们都曾住过。当时上海的生活费用比较高,只好各自想办法,除亲友帮助外,江凌经常写文章赚稿费维持。为了省钱,他们经常住亭子间,没有卫生设备,小便靠自备尿盆,大便得跑到公共租界去,每次还要花几个铜板才准入内。通讯联络只好借用沈钧儒的律师事务所。

随着全国救亡运动日益发展,在江苏省委王翰和胡乔木的领导下,成立了一个由黄敬、胡乔木、吴砚农、江凌、张慧民五人组成的小组,在筹建全国学联的同时参与筹建全国救国会。在各界“救国会”成立的基础上,1936年5月31日,“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”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,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近70人参加了会议,选举宋庆龄、何香凝、马相伯、邹韬奋等40余人作为执行委员,沈钧儒、章乃器、李公朴、史良、沙千里、王造时等14人为常务委员,江凌当选为全国救国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。

1936年10月19日,文化界泰斗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,全国学联积极为鲁迅先生送殡做准备。告别仪式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,参加送殡的全国学联代表有江凌、吴祖贻等人,他们举着大幅挽悼随大队由万国殡仪馆出发,直到虹口公园安葬。庄严壮烈的送葬队伍,像一股洪流,成为1936年下半年最大的抗日救亡示威行动。

【有此一说】

### 王献唐轶事一则

□魏敬群

王献唐曾任山东图书馆馆长,这位齐鲁文化大师一年四季多穿一件深蓝色大褂,只是在冬季加上棉袍,生活简朴至极。所得薪水,半用于书市,家中吃喝接不上时,便将夫人的首饰典卖救急。且举一例:1930年夏,晋军入济,王献唐在隐隐炮声中卸任归家。路过布政司街的敬古斋书肆时,见到黄丕烈手校《穆天子传》和顾千里手校《说文解字系传》,他再也不忍释手,遂将解职所得一月俸俸尽付书商。

王献唐个头约有1.9米,脚也大,喜穿布鞋,因尺码大,市面上难以买到,常需到鞋铺定做。到了后来,便穿三儿媳安可苻做的鞋,又大又肥,走起路来别提有多舒服。济南解放后,王献唐任山东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,经常到省内各地查看出土文物。据其孙子王福来在《记忆里的祖父王献唐》一文中记述:有一次,他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去看出土文物,头一天晚上到了县城,准备第二天到现场调查。在招待所睡觉时,将大褂挂在衣架上,夜里,大褂前襟被老鼠咬去了一大半,穿的鞋也被老鼠拖去了一只。第二天,县里的接待人员赶紧到市场上去给他买衣服和鞋子,可是根本买不到合适的,只好买了一双最大号码的鞋。王献唐一试,脚后跟放不进去,只好一只脚穿着旧鞋,另一只脚趿拉着新鞋,身穿那件少了一半大襟的大褂,坐着牛车到了目的地。在场的人都惊讶地注视着,纳闷他是专家还是乞丐?每当王献唐讲起这段事情的时候,总是和家人一起哈哈大笑。

当时,读到这则学人轶事笔者感觉很有意思,就想弄清楚事情是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地方发生的。

近日,读曲阜文士周凤羽《鲁人随笔》,不想在书中《我所尊敬的人》一篇中找到了另一种说法。文章记述道,大概是1951年夏,周凤羽

当时在曲阜县文化馆工作。一个晴朗的上午,从大门进来几位客人,其中之一在四十五岁左右,瘦瘦的,穿着一件极为平常的

玉白长衫,大襟上一个大大的洞,露着膝盖,不难想见是抽烟没注意被烧出来的。再看脚下,左脚穿的旧鞋非常合适,而右脚却是一只新鞋,看起来很不合脚,因为脚踵还比鞋长出一大块,走起路来两条腿极不协调。从同事口中得知,这就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古代文物鉴赏家,他心慕已久的王献唐先生。后来得知,王献唐在兖州下火车后,没有汽车可乘,只能坐牛拉的那种木轮轿车,土路颠簸,光顾了说话,不知怎么竟把鞋弄丢了一只。车子到了孔府,王献唐入办公室小憩,便立即请人去买鞋,跑遍全城,也买不到这样大尺码的鞋子。王献唐不以为意,就这样从从容容进入文物展览室。

王献唐抽得很凶,据其家人说他一天只用三根火柴,早晨醒来用一根,午饭后用一根,晚饭后用一根。也就是说,除了睡觉和吃饭,他就一支接一支地吸个不停。抗战时王献唐护送齐鲁文物入川,一次乘滑竿上峨眉山,在过一山洞时,竿夫不慎失手,滑竿跌落悬崖,幸被一株藤萝缠住。王献唐让竿夫速去找人来救,自己就躺在悬于万丈深渊的竹椅上,点燃一支香烟,开始吞云吐雾。这样一个嗜烟如命的“瘾君子”,衣服烧个大洞自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。比起老鼠咬坏挂在衣架上的大褂的说法,似更可信一些。

一件事情,两个版本,细节有别,各有所本,但其轮廓大体是清楚的。趣闻背后,读出的是大师超凡脱俗的风度。



## “美髯公”朱仝:不愿上梁山的好汉

□刘传录

梁山好汉108人中山东人有39个,最能代表山东人性格的不是宋江,也不是武松,更不是杀人魔王李逵,而是朱仝。他身上不仅体现了山东人崇拜的“义”,还体现了儒家文化的核心“忠”。

之下怒杀白秀英,被押进死牢。朱仝负责押送杀人犯雷横去济州,在城外却把杀人犯雷横私自放掉,自己被流放沧州,这可不不仅仅是江湖义气的范畴了,侠义的朱仝出现了,朱仝的形象有了质的飞跃,与鲁智深的朗朗侠义之举不分上下。

梁山好汉108人中最不愿意上梁山的不是秦明也不是扈三娘,而是朱仝。不上梁山是一种姿态,更是一种信仰。放走晁盖,宋江和雷横是朱仝义的表现,而不上梁山是朱仝对国家的忠的体现,是大是大非的问题。朱仝对梁山的两任寨主都有大恩,上梁山是最受欢迎的,朱仝没有因为义气而放弃信仰,他放走晁盖、宋江不是为了让他们做强盗,而是保全以求招安,上梁山为土匪

是朱仝不能接受的。

放走雷横后,朱仝没有步雷横后尘上梁山,而是接受审判,到沧州去服刑,这是对国家法律的重尊重,也是对国家忠心的一种表现形式。他的忠心感动了沧州知府,知府把他留在厅前听用,把自己的爱子让朱仝看管,每天带着四岁的小衙内上街闲耍。

七月十五盂兰盆大斋日,雷横抱着小衙内看放河灯。吴用、雷横到沧州,劝朱仝上梁山,被朱仝拒绝,朱仝说:“先生差矣!这话休提,恐被外人听了不好。雷横兄弟,他自犯了该死的罪,我因义气放了他,出头不得,上山入伙,我亦为他配在这里。天可怜见,一年半载,挣扎还乡,复为良民。我却如何肯做这等的事?你二位便可请回,休在此间惹口面

不好。”他说得义正词严又情真意切,只有一个愿望,复为良民,对国家、大宋王朝拳拳忠心溢于言表。朱仝的忠心不是金钱和快活能打动的。

吴用、雷横劝说无效,使李逵把小衙内劈成了两半,朱仝被逼得实在没退路了,只好上了梁山。但他几次想与黑旋风拼命,看出他对滥杀无辜的愤恨,也表现了他上梁山的无奈。对比秦明,自己老婆被宋江“借刀杀人”也没这么急过;扈三娘一家都被李逵灭了门了,也好像没事一样。朱仝无奈上梁山淹不了他对国家的一片忠心。

朱仝对国家的忠心朝廷是知道的,征方腊胜利还朝后,宋江落了个被毒死的下场,而朱仝授保定府都统制,在宋辽对峙的前沿,远离朝廷,一心一意训练军队。后随刘世光破了金军,做到太平军节度使,成为一方诸侯,和呼延灼一起成为为国家抗金再立新功的好汉,不幸的是呼延灼战死疆场,朱仝善终算是对他忠心的一种奖励吧。